

古尔纳海边的印度洋流动叙事视角下的人物困境与出路

段菁菁 王瑞辰 薛桐瑾

(天津外国语大学)

DOI

摘要: 英籍坦桑尼亚裔作家古尔纳的《海边》聚焦后殖民移民生存与心灵困境,呈现殖民后遗症下的身份撕裂与归属焦虑。现有研究多聚焦身份政治与空间理论,忽视印度洋的独立叙事价值。本文以印度洋流动叙事为核心,剖析萨利赫、拉蒂夫等人物跨洋流动中的“双重边缘性”身份困境,其困境交织殖民话语、伊斯兰文化异化等因素。本文以世界主义为解法,通过“讲故事”实现跨文化差异共处,以瑞秋为代表的好客实践为移民身份重构搭桥,揭示“流动-困境-和解”逻辑,为后殖民流散文学研究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 《海边》; 印度洋流动叙事; 身份困境

The Predicaments and Solutions of Characters in Gurnah's Coastal Indian Ocean from a Narrative Perspective

Duan Jingjing, Wang Ruichen, Xue Tongjin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novel *By the Sea* by British-Tanzanian writer Abdulrazak Gurnah focuses on the survival and psychological challenges of postcolonial migrants, depicting identity fragmentation and anxiety over belonging in the aftermath of colonialism. Existing research largely concentrates on identity politics and spatial theory, neglecting the independent narrative value of the Indian Ocean. This paper centers on the Indian Ocean as a narrative of movement, analyzing characters such as Saleh and Latif, who face the dilemma of 'dual marginality' in their transoceanic movements, a predicament intertwined with colonial discourse, the alienation of Islamic culture, and other factors. Drawing on cosmopolitanism as a solution, the study shows how 'storytelling' enables the coexiste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how hospitable practices exemplified by Rachel help reconstruct migrant identity. It reveals a 'movement - dilemma - reconciliation' logic, offering new perspectives for studies of postcolonial diasporic literature.

Keywords: *By the Sea*; Indian Ocean narratives of movement; identity dilemmas

一、研究背景

小说《海边》是英籍坦桑尼亚裔作家阿卜杜勒拉克·古尔纳的第六部小说,出版于2001年。《海边》聚焦移民的生存与心灵困境,主角萨利赫逃离战乱故土,在异国艰难立足却始终深陷疏离。小说以克制笔触交织过往记忆与当下现实,勾勒出身份认同的迷失、故土羁绊与他乡隔阂,于平淡叙事中藏着深沉的孤独与对归属的隐秘渴求,尽显古尔纳对移民群体生存状态的深刻洞察。古尔纳作为后殖民流散文学代表,其作品聚焦非洲族裔的身份困境,《海边》以桑给巴尔到英国的跨洋叙事,深刻呈现殖民后遗症下的记忆撕裂与认同挣扎。

(一)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界对古尔纳及其作品的研究起步较早,2021年其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关注度骤升,核心研究围绕后殖民语境与流散经验展开,对《海边》的解读形成两大方向。其一为历史记忆与身份政治研究。该方向聚焦个体与集体

记忆的张力,以殖民历史为锚点,剖析桑给巴尔革命后非裔群体的身份困境,探讨殖民遗产对个体生存的深层影响。国内学者蒋晖从世界主义视角回应身份困境,高文惠则聚焦跨国难民身份叙事与自我重塑,折射欧洲对“他者”的文化排斥。其二为空间叙事理论应用。部分学者借助空间理论解读印度洋的矛盾交汇属性,国内研究虽关注文本空间属性,如谢丹凌提出“三重空间叙事”,但多将空间拆解为具象地点,未将印度洋视为独立叙事场域,仅少数研究提及相关元素,缺乏系统性分析,仅徐超超等学者通过地图建构相关政治图景。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聚焦身份政治与空间理论,但忽视海洋独立叙事价值,存在理论与现实语境结合空白。印度洋史研究的“全球史转向”表明其贸易网络的文明互联价值,而现有研究未深挖其与身份建构的关联。本研究以印度洋流动叙事为核心,填补二元对立解读范式空白,建立跨学科对话,丰富移民文学研究视角。

（二）印度洋流动叙事和世界主义

印度洋在地理上与小说《海边》的关系密不可分，印度洋西部就是斯瓦希里和阿拉伯海岸南部。而斯瓦西里在阿拉伯语当中意为“海岸”，即为印度洋海岸。整个故事即围绕几个人物的印度洋跨洋流转展开，萨利赫第一次见到地图时，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地图：西北欧的海岸、伊比利亚半岛、南欧、沙姆地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北非海岸、北非海岸凹凸曲折，向下溜到好望角……他用粉笔画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线，勾勒了半个已知的世界”（Gurnah44）。这半个已知世界即是以印度洋为中心的世界。印度洋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本身具有流动性，消解了国家之间固有的民族边界、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元对立，是连接非洲、亚洲、欧洲的“流动区域”，印度洋在小说中也作为解决问题的路径：他们还可以环印度洋流转。在文本中不仅涉及拉蒂夫和萨利赫印度洋地理空间的流转，也有萨利赫对侯赛因祖父的环印度洋贸易回忆。

迈克尔·皮尔森将印度洋的历史阶段划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在地理学意义上，印度洋在历史上有记载到1800年左右；第二阶段为19世纪早期，英国舰队驶入印度洋，使得之前的季风洋流等地理因素不再阻碍贸易发展，一直持续到今天（12）。印度洋最重要的地理特点就是季风按照季节倒转方向，这种完全可预测的模式使之成为当时最理想的贸易环境。长达几个世纪的贸易流动，导致桑给巴尔的居住者鱼龙混杂，让这里成了全世界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种鱼龙混杂导致生活在桑给巴尔的人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土著居民，每个人都来自其他地方，这便是世界主义：多种族或多元文化的社会鼓励少数群体的种族、文化、经济发展（Moorthy, 74）。凯·克莱斯（Kai Kresse）将海滨世界主义定义为通过特定的海洋环境所促进的多种连接，创造更广泛的城市统一性，从而在整个世界上获得更广阔的视野。（45）本文所指“印度洋流动叙事”，包含三重维度：地理层面的跨洋迁徙、历史层面的印度洋贸易与殖民流动、叙事层面的“海洋视角”（以印度洋为核心串联记忆与现实）；结合凯的定义以及《海边》的文本，我们可将印度洋世界主义提炼为两点：一、物理层面的世界主义，东非沿岸向各地人民敞开，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开放的海岸文明；二、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以萨利赫为代表的东非海岸居民通过故事将自己与远方的经验相连，建立起想象中的“海洋共同体”（刘欣冉99）。本文将从印度洋流动叙事和世界主义来论述人物跨洋的流动性与困境，以及通过世界主义来找寻出路。

二、印度洋流动中的人物轨迹与多重困境

（一）印度洋物理流动：贸易与航海语境下的跨洋实践

跨洋流动即跨印度洋的地理空间的转变，即为物理层面的世界主义。商人侯赛因和船长那索尔都是因为印度洋

信风流转各地，在斯瓦西里海岸停留，其中侯赛因作为一个流动的商人，“这是他第三次来非洲做生意。此前，他的家族没有来过这里，他们的生意主要在更遥远的东方”（Gurnah27）。他是故事的引子，其无固定居所、跨文化交往的特性，使其得以介入舍尔邦与萨利赫的房产抵押纠纷，流动本身就是纠纷的“前提”，体现印度洋对人际关系的重构。侯赛因打破了石头镇上固有的人际关系，虽然是来自巴林的波斯商人，对于当地小镇来说是一位入侵者，却因流动成为“参与者”，而小说跨洋流转也不仅仅局限在后殖民时期，也有侯赛因祖父加尔法·穆萨的殖民历史，重现了历史上环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往来受制于欧洲公司，展现了由盛转衰的家族企业图景。

船长那索尔代表了在印度洋海上跨洋流转的船长，他们是传统家庭秩序之外游离并吸收上一代教训、管理好遗产的好丈夫，能做出这样决定也和那索尔多年在船上吸收新观念有关。侯赛因与那索尔的流动，共同勾勒出前殖民与殖民过渡期环印度洋流动的两种典型形态：一种是逐利而行的商人流动，一种是顺应自然的航海者流动，二者均以印度洋为纽带，在跨文化交往中重构人际关系。

（二）印度洋流动催生的身份困境

东非流散者如小说中的萨利赫和拉蒂夫对于民族身份认同仍以海边小镇为重而不是基于非洲大陆内部对陆地的追忆。萨利赫和他的朋友赛福从麦克雷雷大学毕业，去了好朋友贾马尔·侯赛因的故乡布科巴旅行，布科巴位于坦桑尼亚西北部。但在这里他们并没有受到欢迎，相反，他们被安置在储藏室住，甚至还被陌生女人从楼上泼水。这暗示内陆群体对海边身份的排斥心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赛福家乡马林迪，“来到海边就像回到了家，甚至不止于此，那好像是冥冥之中早已注定的”（Gurnah203）。相同的海边身份让他们获得热情款待。印度洋就是海边人们的联结，海边小镇能够增进身份认同感，这也是为什么萨利赫在英国也只是想要一个在海边的房子。跨印度洋流动不仅在地理空间上转换，他们的身份也是随之流动的，在萨利赫和拉蒂夫见面之时，消解家族矛盾的办法就是身份认同。

萨利赫和拉蒂夫原本都是在桑给巴尔长大，拉蒂夫由于母亲是发展与资源部部长的情妇得以到民主德国去学牙科，开始了跨洋离散，这是地理上的跨洋迁徙，后和笔友杨一起在德国旅行后以难民身份环游到英国，此后在英国任文学课教授，当和萨利赫见面之前，是作为难民署的斯瓦西里语翻译身份，是“披着神圣外衣的难民救赎者”（Gurnah86），此时身份经历了从难民到学者又到拯救难民者，但内心一直对于“嬉皮笑脸的黑摩尔人”怀有民族自卑心理，直到与萨利赫相遇才两个人又因为共同的民族身份有了联系。萨利赫所面对的身份困境是对于自己体面的文学教授身份和高高在上的难民救赎者身份与精神上被

忽视和在异乡的无根身份的冲突。

“这让我觉得，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我一直都在，没有被遗忘，不是在丛林里生根发芽，不是一丝不挂地从一棵树荡到另一棵树，几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待在字典里面，对着人们傻笑”（Gurnah83）。这段自白道尽了他的身份悖论：既渴望挣脱殖民话语的枷锁，又无法摆脱殖民历史的阴影；既试图否定被建构的“他者”身份，又难以找到重构自我的有效路径。即便是桑给巴尔这一出生地，也无法成为他的精神原乡，而“在字典里面对着人们傻笑”的隐喻，更直指非洲叙事长期被西方殖民者垄断的现状——萨利赫渴望发出非洲自身的声音，却在西方主导的话语环境中步履维艰，“街上有人说是嬉皮笑脸的黑摩尔人”（Gurnah81）的遭遇，以及文本中反复出现的“黑摩尔人”称谓，既是拉蒂夫身份自卑的外化，也是其寻求自我重构的隐秘渴望，更承载着古尔纳重塑非洲叙事的创作诉求。

在自我怀疑过后拉蒂夫接听了难民署的电话，得知了萨利赫的存在，过去的家族记忆再次重现，和父亲一样的名字让拉蒂夫觉得这一定是萨利赫开的玩笑。萨利赫所用的“赖哲卜·舍尔邦”也是萨利赫身份困境的体现，合法的跨洋流转必需是护照，萨利赫在无端坐狱十一年后被赦免归来后不允许用自己的身份办护照，而舍尔邦的出生证明刚好因为房子的流转到了萨利赫的手上，因此得以办护照来到英国。历史的后殖民人口流动也是印度洋流转的一部分，“许多人都要么离开了，要么被驱逐了，要么已经死了。剩下来的人也都遭遇了无数的邪恶和苦难，没有哪个人大包大揽，也没有哪个人能逃脱”（Gurnah273）。在桑给巴尔独立以后，公民身份不再关乎对国家的归属感，而是能够对自身及后代有一定的经济保证和生活水平（Mathews5）。1957年至1963年的种族话语使得这种针对邻居和政治对手的违法暴力盛行。在独立后，很多人因为无法保证自己的生活相应离开。萨利赫在出狱后非但没有能力维持自己稳定的生活，反而还被哈桑辱骂没有归还他应得的遗产。在对国家法律体系彻底失望后，萨利赫彻底展开了他的跨洋流亡。拉蒂夫父亲的命名本是对伊斯兰文化的呼应，而萨利赫盗用此名流亡英国的行为，却映射出伊斯兰文化在跨洋流动中的异化——虚假的身份让他在异乡始终处于“他者”位置，强化了无根的生存状态，成为后殖民流散群体身份困境的具象表达。

萨利赫与拉蒂夫的跨洋流动，本质上可分为两个层面：物理层面的世界主义与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跨印度洋的地理空间迁徙，构成世界主义的物理实践维度，而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则通过“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得以实现，成为破解身份困境、达成精神和解的关键路径。在萨利赫和拉蒂夫见面后进行了多次谈话，萨利赫将家族的原委与自己多年的经历以及未用拉蒂夫父亲的名字的原因全盘托出，使得本来多年未曾与桑给巴尔有过联系的拉蒂夫在精

神上回到了印度洋沿岸，“因为他也需要知道我所知道的事情，填补他认知的空白，让他生活中的沉默发出声音”

（Gurnah169）。萨利赫和拉蒂夫放下家族恩怨与两人之间的芥蒂，两人分别能够以开放的态度面对异乡和故乡，萨利赫逐渐接受在英国的生活，他会听取瑞秋的建议去海边散步甚至还去伦敦拉蒂夫家做客；拉蒂夫也放下对萨利赫的仇恨，对家族尘封许久的感情集中爆发。因此世界主义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带着仇恨与误解共处”，萨利赫接受伦敦生活、拉蒂夫放下仇恨，正是差异性共处的实践。

侯赛因给萨利赫通过讲故事这样的方式使得萨利赫非常信服，因为在文字出现以前的漫长历史中，讲故事一直是非洲人民记录历史、传播文化和交流经验的重要方式。又加之侯赛因可以用英语来讲述，更是加深了他故事的可靠性。于是萨利赫就中了侯赛因的诡计被骗，也暗示了萨利赫所代表的前殖民时期的“这种借贷是买卖人常有的事，尤其是跨越大洋的买卖”（Gurnah38）对外来者天然的信任思想的失效。

三、向世界主义找寻出路

在小说结尾作者并没有明确提出关于萨利赫和拉蒂夫未来会如何，但正如阿皮亚提到的世界主义观点一样，参与他人的经验和想法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即使双方无法存在共识。因此即使萨利赫认为适应拉蒂夫在伦敦的生活比较困难，但他至少还“带着阿方索的毛巾，所以无论如何都能凑合”（Gurnah285）。拘留所同伴阿方索的毛巾代表着他者的经验，萨利赫借助毛巾可以保持尊严，也是对自己身份的一种确认。他不是突兀地直接融入，而是带着自己的身份特质与之共处。这一结尾也回应了古尔纳对后殖民世界主义的思考——后殖民语境下的世界主义，不是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文化施舍，而是移民群体内部带着差异共处的日常实践，萨利赫的毛巾，就是这种实践的最朴素象征。

难民署官员瑞秋·霍华德的世界主义实践也是解决萨利赫身份困境的出路，她在萨利赫看来仿佛是他的女儿莱娅一样，她帮助萨利赫转移给地方部门并找到住所，甚至因为萨利赫改进了规则和法律，在完成自己的分内工作之后并没有直接离开，相反，她还在继续拜访萨利赫，帮助他更好地融入这个对他来说是异乡的地方。瑞秋的做法也符合甚至突破了德里达所说的纯粹的好客之道：不论名字和身份无条件地欢迎任何到来的人。瑞秋会尽力找和萨利赫的共同点，邀请他去和她妈妈聊天。基于瑞秋的工作属性他们势必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难民，但符合英国法律要求的才被准入，因此在个体进行好客世界主义实践时，同时也需要国家的制度法规体系来保证与改善难民的生活，使之在异乡找到身份归属感。

结论：

本文以印度洋流动叙事为核心，将海洋从“地理背景”提升为“叙事主体”，融合全球史与世界主义理论，揭示

后殖民移民“流动-困境-和解”的内在逻辑，为古尔纳作品研究及后殖民流散文学的跨学科解读提供新视角。这些人物或选择跨洋流转至英国，却始终未能摆脱“双重边缘性”的身份枷锁——既无法回归母国获得文化认同，又因异质文化的隔阂与本土社会的隐性排斥，在英国陷入“无根”的漂泊状态，凸显了后殖民时代跨洋移民的身份断裂与归属焦虑。

针对这一困境，文本提供了“世界主义”的潜在解法：一方面，外来者可通过精神层面的世界主义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远方的故土记忆与当下的异乡生活相联结，在多元文化的对话中重构自我身份认同，消解“无根”的焦虑；另一方面，以瑞秋为代表的欧洲本地人，以主动接纳、平等共情的态度践行实践层面的世界主义，摒弃本土中心主义的偏见，给予外来者情感与社会层面的支持，为跨文化互动搭建了和解的桥梁。

参考文献

- [1] Hand F. Untangling Stories and Healing Rifts: Abdulrazak Gurnah's *By the Sea*[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41(2): 74-92.
- [2] KRESSE K. Interrogating 'cosmopolitanism' in an Indian Ocean setting: thinking through Mombasa on the Swahili Coast[M]//MACLEAN D N, AHMED S K. *Cosmopolitanisms in Muslim contexts: perspectives from the pas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31-53.
- [3] MATHEWS N. *Zanzibar Was a Country: Exile and Citizenship between East Africa and the Gulf*[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4.
- [4] MOORTHY S. *Indian Ocean studies: cultural, soci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M].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 [5] PEARSON M N. *The world of the Indian Ocean, 1500-1800: studies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6] STEINER T. Writing 'wider worlds': the role of relation in Abdulrazak Gurnah's fiction[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2010, 41(3): 124-135.
- [7] Robbins, Bruce. *Prolegomena to a cosmopolitanism in deep time*[J]. *Interventions*, 2015.
- [8]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海边* [M]. 黄协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
- [9] 樊雪媛. 流动的文学想象与知识生产: 古尔纳《海边》《最后的礼物》中人与物的跨洋流转 [J]. *今日世界文学*, 2025(01): 149-168.
- [10] 刘欣冉. 将东非作为方法——论古尔纳《海边》中的流散书写 [J]. *当代外国文学*, 2025(1): 156-163.
- [11] 蒋晖. 从“后殖民”到“后文明”——古尔纳《海边》中的世界主义 [J]. *外国文学研究*, 2022, 44(02): 30-45.
- [12] 王卓, 郭丹阳. 古尔纳国内外研究现状、问题及展望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3): 113-121.

基金项目: 天津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科研项目: “古尔纳《海边》的印度洋叙事研究”, 项目编号: 2025YJSS025。

作者简介: 段菁菁 (2002-)、女、汉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人、天津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